



红色村寨毛家沟

在距离西吉县将台堡镇政府西南3.5千米、葫芦河西岸的山旮旯里,有一个三面环山、一面横河的小村庄——毛家沟。

虽然偏僻隐蔽、名不见经传,但毛家沟和西吉的众多“红色驿站”一样,是当年红军长征、西征的途经地、驻扎地、活动地,是将台堡大会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西征史、会师史及中国革命史上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笔。

1936年9月14日,由团长阮金庭、政委萧峰率领的西野战军红一军团一师三团进驻将台堡,随警卫连部分战士跨过葫芦河在毛家沟山顶执行警戒任务;9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三团各连、排分片、分地区、分工负责,开始执行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扩大红军,打土豪,组建地方乡村党组织,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等任务。9月20日,红三团奉命独立行动,当晚团部移至兴隆镇,团政治处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派出若干工作组,以兴隆镇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在毛家沟派驻一个排的兵力,一住就是30多天。

红三团派出的红军工作组进驻毛家沟后,分散驻扎在金耀连、石贵福等10多户农民家中,金耀连把他家最大的土窑腾出来让红军存放军用物资,石贵福把他家的土井让给红军用,其他农户也争先恐后地为红



(资料图片)

军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服务。红军战士在打土豪、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帮助当地老百姓收粮打碾、担粪挑水、打扫卫生,红军和贫苦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迹。

据金耀连生前回忆:“当时老百姓都称萧团长(据考证是红三团政委萧峰)来了几次毛家沟,每次来都住在我家,在我家的土窑里放了很多白圆(当地老百姓把银圆称白圆)和粮食、棉衣、羊毛、羊皮,在我家东面台子上还放了3架缝纫机(当地

人把缝纫机称为缝衣机),大部队来到将台堡的第二天,萧团长带了几十人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住在我家庄子里的红军也跟着走了,红军走的时候我们庄子的人都送来行,有的帮着红军拿东西,有的还给红军手里硬塞了煮洋芋、煮鸡蛋和馍馍,有的人还哭了。”

据石家后代石代明介绍:“我爷爷叫石贵福,我奶奶叫王有琴。爷爷、奶奶共生了三个儿子,我大爹名字叫石丁相,我父亲名字叫石正华,我三爹名字叫石正荣。听我父亲讲,当年红军来的时候也在我们

住,我们家的水井就让红军吃喝、洗衣服、饮战马。当时我大爹才15岁,和红军好得很,经常帮红军喂马,红军走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从此再也没有音信了,直到1963年8月,西吉县政府把一块‘光荣军属’的木牌子送到我们家,这是唯一的证据。我父亲临终时把牌子交给了我三爹,我三爹临终时又传给了我,这是我们石家的光荣,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1936年10月21日,红三团政委萧峰,遵照红一军团和红一师首长长权、聂荣臻、邓小平、陈赓、杨勇等的命令,率领一个连,把存放在西坪村杨五沟谢国义家土堡子里的粮食、牛、羊、牛羊皮、羊毛及银圆等运往毛家沟金耀连家,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后,萧峰政委就带领部队把存放在金耀连家中的5万块银圆、50头猪、20头牛、2000只羊、数万斤粮食、100套棉衣、数百张羊皮、2万斤羊毛和3架缝纫机等运到将台堡,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

毛家沟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但当年西征红军红三团部分干部战士在这里驻扎、活动了32个昼夜,建立了农会组织,也成了当时红一方面军为红二方面军储存军用物资的重要地方之一。红军的事迹在毛家沟老百姓中代代相传,使毛家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寨”。

(据《多彩西吉》)

青铜峡中共宁夏工委旧址

青铜峡中共宁夏工委旧址,原汉坝小学旧址,位于今青铜峡市古峡东街87号。汉坝小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宁夏工委的活动场所之一,1940年3月,崔景岳在此主持召开宁夏工委会议,宣布重建宁夏工委,并作出工作安排。2021年11月,青铜峡市委、市政府在此立碑标识。

1912年,汉坝小学在青铜峡汉坝堡汉延渠闸东北娘娘庙设立。1933年,迁至龙王庙东侧汉延渠办事处院内。1940年3月,崔景岳在此主持召开会议,决定重建宁夏工委。1943年,学校迁至城隍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汉坝完全小学。1960年,学校搬迁至青铜峡市步行街今址。1978年,恢复汉坝小学名称。

2021年11月,青铜峡市委、市政府在党早期宁夏工委的活动旧址——汉延渠进水闸东北,建成中共宁夏工委旧址纪念碑及展板。纪念碑采用砂岩雕刻,高2.1米、宽2.6米、厚0.8米,正面镌刻崔景岳、白玉光、王博浮雕像,背面镌刻“中共宁夏工委旧址纪念碑序”。在纪念碑北侧,设立“青铜峡市党史宣传教育阵地”展板,分别展示“中共宁夏工委旧址——原青铜峡(宁朔县)汉坝小学”“革命信仰至死不渝(革命先烈崔景岳、白玉光、王博简介)”。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战力量,组织发动宁夏各族人民,开展广



(中共宁夏工委旧址纪念碑)

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使宁夏国民党当局坚定抗日决心,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宁夏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为了加强宁夏工作,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由杨一木、李仰南先后任宁夏工委书记。1938年底,杨一木等身份暴露,许多党员被迫撤回陕北,宁夏党的工作陷入瘫痪。1939年至1940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马鸿逵的反共活动也逐步升级,变本加厉地对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侦察、搜捕和破坏。1939年10月,李仰南到延安向中央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说明自己身份已暴露,请中央另派他人到宁夏工作。恰在此时,崔景岳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西北工委决定崔景岳接替李仰南担任宁夏工委书记。同时,派朝邑县委书记王博和崔景岳一起到宁夏开展工作。他们进行了周密研究,最后决定从陕西赴宁夏的商人身份开展工作,于12月下旬来到中宁县协吉号。崔景岳按事先约定的接头关系,与李仰南接上了头。接头后,王博被安排在宁朔县小坝小学白玉光处,崔景岳被安排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马云泽处,以代课教师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安排妥当后,李仰南带崔景岳到各地交接工作,了解情况,同党员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并对党的基层支部进行整顿,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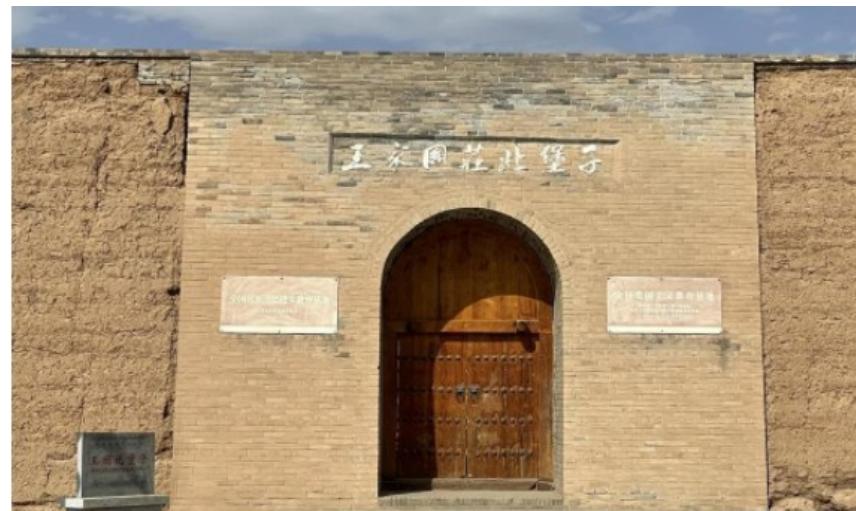
了党支部负责人。1940年春节后,李仰南交接完工作后,返回延安。崔景岳回到汉坝与白玉光、王博研究工作,重建宁夏工委。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崔景岳在青铜峡汉坝小学主持召开宁夏工委会议,白玉光和王博参加了会议。崔景岳代表中央西北工委宣布重建中共宁夏工委及宁夏工委组成人员,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负责组织工作,王博负责宣传工作。会议分析了宁夏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研究了如何解决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问题,确定由白玉光起草一份文件,专门谈这方面的问题,传达到各支部,由崔景岳

起草一份给中央西北工委的报告,汇报宁夏工作情况。崔景岳要求将一部分身份已经暴露的抗大学生尽快调回陕甘宁边区。还决定以汉坝小学和宋澄堡小学作为中共宁夏工委机关。会后,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工委会议精神,并安排部分同志撤离宁夏。

1940年4月,由于敌特跟踪追捕及叛徒出卖,崔景岳、白玉光、王博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先后被捕,宁夏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1年4月17日,崔景岳、白玉光、孟长有3人在银川城隍庙(今银川市景岳小学)被敌人活埋,英勇就义。

(据宁夏党史教育)

红色记忆的传统力量



(资料图片)

同心县王团镇北村的北堡子古朴沧桑。沿着高大的城门进入北堡子,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照壁,照壁上“豫海

王学福弟兄二人所筑,初建于1919年。1936年8月21日西征红军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和回民独立师进占同心城、王家团庄一带,红军占领王家团庄北堡子后,这里先后成为回民独立师师部驻扎地和红二师师部驻扎地。

在这里,政府主席马福主持召开了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了政府八个部委委员,安排部署了筹粮、筹款、支援前线,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等政府主要工作,草拟发布了政府的第一份公告——《告北圈子四周同胞书》,红军三大主力会聚同心城后,中央指示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被任命为总指挥,统一指挥三军,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等三军首长在这里研究部署了三军会师后的统一行动。

北堡子的底色虽是红色,但想要保护好这层“底色”,打磨出“成色”,守护好这片红色资源需要时间和耐

心。政府为了摸清摸准同名物资源底数和保存现状,建立文物数据清单,梳理出各类红化遗迹22处。研究制定了《同心县红色文化遗迹管理办法》,用于区分不同现状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实现革命文物的整体规划、连片保护和统筹展示。

北堡子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将红军长征纪念馆、陕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会、办公旧址等革命遗址开辟为党史学习教育“第一课堂”,这样一来,红色资源就转化为教学资源了。从展陈展示、“红色旅游”、到瞻仰体验,革命精神被巧妙地融会贯通到各种系列活动中,“红色基因”就这样不断地薪火相传下去。

北堡子现有文创产品丰富多样,百姓所创作的红题材剪纸、农民画等创产品有200余种。通过线上线下销售传播出去的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变得可触摸、能感知,让文物活起来。

(据中国日报网)

三、加强组织领导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完善

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本质上是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开展的一项社会动员。短期内,群众投稿的热情高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也出现些许偏向。对此,党及时调整政策,通过组织化的方式,使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走向完善与成熟。

动员群众写稿,目的是使群众参与到革命实践中去,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同时也使党领导的革命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但政治事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实践表明,群众对于基层建设的认知需要党和政府的不断引导。

为了引导群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各地开始成立通讯小组,适时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将其组织起来。相关部门直接告知小组成员写稿的重点,引导其深入观察、分析和了解有关政策,实现新闻队伍的组织化。

比如,延川县委宣传部建立了区级通讯小组,由区委书记、区长直接领导,提出每一个时期应报道的中心主题。宣传部门还帮助通讯员搜集材料,解决写作中的具体问题,组织辅导语言、措辞、表达的要点等。

通讯组织的领导还加强了写作的针对性。宣传部门发现,群众来稿内容的细节大同小异,对地方建设的介绍也缺乏特点,关于工农队开荒的新闻基本上以数字罗列为主,显得枯燥。因此各县委着手引导通讯员在根据地建设中重点观察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如社会教育如何开展、边区工厂产品质量、合作社建设、群众医药卫生防疫等。

基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初衷,党鼓励投稿者多方面观察边区存在的问题,深入描述具体事实,甚至提供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抽象地泛泛而谈。此外,通讯小组内部也要进行分工合作。由于根据地的建设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相关新闻报道必然会运用相关领域知识。若要求从事经济事务的通讯员负责报道模范卫生村的新闻,稿件就容易流于形式。《解放日报》强调,通讯写稿只有与通讯员本身的工作密切联系,才能使问题“专”和“精”,提高稿件质量。

依照安塞区的经验,在新闻工作开展前,应召开通讯员会议。以安塞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报道为例,会前区委召集通讯组织成员,为介绍大会的基本情况,分配具体任务,如妇女生产、变工队扎工等,各主题都指定专人写稿,各地区事务都由熟悉当地情况的通讯员负责。“熟悉者负责”的任务分配方式,使新闻报道具有连续性,避免信息零碎,出现漏洞。

通讯员组织的建立,使得工农通讯员既可以得到写稿业务的技术指导,也能加深对政策的理解,提高思想觉悟。不难看出,根据地的通讯小组具有宣传、组织和教育的多重功能。但在部分地区,工农通讯小组仍存在形式主义的偏向。其中的典型表现为一味追求投稿规模,要求通讯员每月完成固定数量的稿件。

在安塞区,通讯组织作出规定,每名通讯员的定额任务是一个月写一篇,而当指令传达至区级通讯组织时,标准则提高到“平均每天写稿一篇”。这样的任务标准必定降低文章质量。至抗战后期,工农通讯员稿件依然存在缺乏具体内容、细节不真实的现象。

究其原因,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动员式教育在短时间内所能完全实现。细节精确、内容翔实是新闻写稿的基本要求,而传统农业生产中缺少对“精准”一词的重视,农民普遍习惯于“差不多”“大约”的概算,因此稿件涉及数字的具体细节时往往模糊不清。延安有个水泥匠打窑洞,别人明确要求高一丈二,他却实际只打了一丈一尺五。别人问他,他答道:“一丈一尺五还差不多。”由此,选择有一定文字能力的群众进行重点培养,使其成为骨干通讯员就成为现实需要。

战争是影响工农通讯员制度实施的另一个因素。实践中,财政动员、征兵工作、生产开荒、防灾防疫等事务都直接关系到边区的生存,与新闻工作相比更具紧迫性。基层党组织不得不将这些工作置于优先地位,由此也导致通讯组织的管理缺少连贯性。盐池二区宣传科长赴延安参加会议,该地工农通讯工作便陷入暂时停顿。

1945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妄图向根据地发起进攻,陕甘宁边区开始准备必要的社会动员,新闻宣传工作的重点在于反对内战,宣传部门不得不将精力投入舆论宣传工作,延缓了对工农通讯员的组织培养。西北局宣传部调查发现,边区的通讯工作在1945年下半年存在松懈现象,投稿的数量与质量均出现下滑。

有鉴于此,西北局在各县委宣传部门增设通讯干事一职,专门负责管理全县的通讯工作,帮助工农通讯员写稿、搜集素材。骨干通讯员的选拔培养与通讯干事的设立,体现了党在战争环境下的灵活与机动,也意味着工农通讯员制度逐渐走向完善与成熟。

1946年,解放日报社发现,许多通讯稿件比之前更加生动、感人。在吴堡县慕家崖村,农妇通讯员李锦秀积极参与写稿,提高文化水平,其文章《模范学董主任》被《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李锦秀本人也成为当地文化教育工作的核心分子,在基层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林伯渠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应是帮助人民学习政治,体验自己意志的舞台。工农通讯员在搜集写稿所需要的信息时,观察革命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乡村生活,了解群众在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报纸成为展示革命力量的斗争舞台。读者不仅是坐在台下接受宣传的观众,也能够登上台去展示自我。张闻天曾总结道,当群众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党的路线正确时,他们会积极参与革命并为之奋斗。在陕甘宁边区,群众在认识到自己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后,开始主动响应各级党组织的号召,最终实现了从“要我革命”到“我要革命”的转变。

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及完善,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传播领域运用的成功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成功案例,其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和工作方法,对今天做好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据《党的文献》)